

历史时期宁夏居住形式的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刘景纯

摘要：宁夏地区历史时期人口居住形式的主体包括城居和乡居两种基本形式。乡居形式的出现和中原地区在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比城居形式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变化也比较频繁。而城居形式的出现明显要比中原地区晚，在类型上主要有郡县体制下的行政城镇、军事城堡和商业市镇三种类型。其中，商业市镇出现最晚；郡县体制下的行政城镇居住形式在以后的历史运动中基本稳定，变化不大；军事城堡式居住形式在宋、夏和明代最为突出。城居形式和乡居形式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地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结构性限制，一些军事城堡则与具体的军事环境密切相关。在传统农牧业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下，这种居住格局难以超越自然环境的总体限制，因而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

关键词：清代以前；宁夏；城居形式演变；乡居形式演变；居住与环境的关系

作者简介：刘景纯（1965—），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西北地区人文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居住形式是人类居住形态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中，目前已知的最基本的居住形式，有城居和乡居两个方面。这其中，城居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居住形式，也是集中居住的一种居住形态；而乡居是一种较为低级的居住形式，也是分散居住的一种居住形态。在乡居形式中，根据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在类型上有山居、水居、平地居住等村落，或者其他功能或文化意义上的不同的居住形态。它们的具

体内容，虽然因文化共同体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实际上也因地区环境的不同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特色。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历史上长期处于边塞重地，在民族构成上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的居住形式如何？它们与环境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此加以论述。

一、城居类型与时代变迁

像世界各地一样，历史上宁夏的城居时

代晚于乡居时代，因为是边塞地区，其城居的出现也较中国内地要晚得多。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在西周时期，今宁夏固原地区一些居民开始过上城居生活^[1]，这些人员可能主要是西周征伐獫狁时的军人，他们所居住的城池，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的创设。固原地区城居现象的出现，是早期中原农业王朝在捍卫农耕文化的安全性和因此而不断地向外扩张中将城居文化传播或引入到这里的。自此以后，活动在宁夏南部地区的一些部族也先后不同程度地进入城居生活。春秋战国时期，今宁夏境内生活着匈奴、胸衍、义渠、乌氏等部族。匈奴、胸衍主要活动在宁夏北部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义渠、乌氏分布在宁南固原及甘肃庆阳一带，春秋时代尚是“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的散居状态，战国时代“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开始进入城居时代。秦惠文王十年（前315年）征伐义渠，“遂拔义渠二十五城”^[2]，说明义渠国已经修筑了不少的城池，义渠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过着城居的生活。秦昭王三十七年（前270年），秦灭义渠，将秦的疆界推进到昭王所修长城一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又派蒙恬北征匈奴，夺取黄河以南地区，自此以后宁夏全境纳入中原王朝的领土范围。与此相应，行政中心城镇建立，并在空间管理上覆盖了宁夏全境。

（一）郡县制下的行政城镇

行政中心城镇设立的情况可分作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统一王朝的行政建制，具体涉及秦、汉、隋、唐和元、明、清诸朝。秦设立管辖宁夏南部的第一个、也是宁夏境内最早被管辖的郡是北地郡。这是秦灭义渠国后建立的一个郡级城镇，该郡以后曾管辖义渠、乌氏等15县，但除朝那（今宁夏固原城东约50里古城乡）一县在今宁夏范围以内外，其余均在陕甘境内^[3]。就

是郡城治所也在今甘肃宁县，因而从城居方面说，与宁夏关系不大。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后，在黄河以南设立新秦中郡，当时除今固原地区一部分属北地郡外，以北的宁夏全境都在该郡的管辖范围之内^[4]。秦在该郡设置有44县（一说34县），“为筑城郭，徙民充之”。这些县可考见且分布在宁夏境内的有：胸衍道（地望不明）、胸衍县（今宁夏盐池县北柳杨堡乡张家场古城）、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市西南），其余大部分县名称、地望因文献缺载而不明，估计其中还有一些县是分布在宁夏境内的。秦朝末年，中原离乱，这些地方又被匈奴占据，以前的城镇多被摧毁殆尽。

西汉建立后，重建这里的政治秩序，并在以前秦县的基础上重新恢复郡县制度。后包括东汉在内，两汉时期这里分属于安定和北地二郡。安定郡治所在高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下辖今陕甘、宁夏境内21县，其中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朝那（今宁夏固原城东约50里古城乡）、参□（今宁夏同心县东南）、胸卷（今宁夏中宁县南）、三水（今同心县下马关乡红城水古城）等5县城，分布在宁夏境内；北地郡治甘肃庆阳西北马岭镇，管辖19县，其中灵武（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堡西，东汉废弃）、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灵州（今吴忠市古城湾附近）、胸衍（今宁夏盐池县北柳杨堡乡张家场古城）、廉县（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等5县分布于宁夏境内^[5]。东汉时虽然个别城市位置略有变动，郡治也有所迁移，特别是中后期羌人屡次反叛，一些行政中心城镇内迁。如果排除这些因素，那么稳定时期宁夏境内的郡县级城镇当保持在10个左右。

唐代全盛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宁南属于泾原节度使，下辖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管辖4县，

其中平高（与原州同城）、百泉（今宁夏固原城东约 50 里古城乡）、萧关 3 县城分布在宁夏境内；宁北设灵武节度使，下辖灵州管辖 6 县，即回乐、灵武、保静、怀远、鸣沙、温池，都在宁夏境内，其中灵武在开元（713—741 年）以后常为朔方节度使治所。另有皋兰州（治鸣沙县），安乐州^[6]，实有 10 座行政中心城镇。

元朝统治时期，宁夏分属陕西、甘肃两个行省，甘肃行省境内黄河沿线有中兴州、应理州、鸣沙州、灵州和定州 5 个州城，下辖怀远、灵武、河渠 3 县，其中怀远与中兴州同城；陕西行省下设开成府路、开成州、开城县（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关），三者同治一城。另有广安州（治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境）、广安县（与州同城）、隆德县，而开成西安王府位于开成府路城以南不远处。开成以北至黄河以南，以及河东至今盐池一带，当时是非常广袤的高原荒漠草地景观，没有什么行政城镇设置。全宁境内有 10 个行政中心城和 1 个王府城。

明清时期，先是雍正以前至明代这段时期，宁夏境内主要是边防区及其遗制，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一种以军人为主体的准军事社会，行政建制相应的主要以卫所形式存在（后文论述）。自明代以来持续稳定的行政城镇大概只有隆德县，其他的几个城也在后来都转化为卫所。雍正二年（1724 年）以后，重建府州县体制，北部宁夏府下辖灵州、宁夏、宁朔、平罗、中卫一州四县，宁夏、宁朔二县与府同城。雍正五（1727 年）、六年（1728 年）又分设新渠、宝丰二县，但乾隆三年（1739 年）大地震后该二县被废，实际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同治十一年（1872 年），设宁灵厅（治今吴忠市西南金积镇），这样到清朝末年宁夏府实有 5 个行政城镇。而南部固原州，清初属于甘肃平凉府，同治十二年（1873

年）升为直隶州，下设平远、海城二县。同治十一年（1872 年）又置化平川直隶厅（治今泾源县城）。加上隆德县，实际有 5 个州县城。总合起来说，当时宁夏境内南北合计约有 10 个左右的行政建置城镇。

综合以上论述，自秦国和秦王朝时代逐步和全面在今宁夏境内建立统一的郡县制以后，直到清代的 2 000 多年里，主要且强大的统一王朝时代，宁夏境内基本的郡县级行政城镇总体上维持在 10 个左右。这些城镇在分布上南北略重，中间至东北盐池地带中空，但南北两域城镇分布上略相平衡。中部地区，包括固原以北，中卫、中宁以南和吴忠、灵武以东至盐池以南之间的大片地域，之所以始终是行政城镇分布最稀疏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这里的高原荒漠、草地景观与环境的严重制约和影响。虽然 2 000 多年来古典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始终很难突破这种天然的限制，以至于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开发，进而影响到行政城镇的发展。

非统一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西晋统一王朝存在时间短促，总体上算在这一大分裂时期中）和北宋、金、西夏并峙两个时代。东汉以后，西部羌人不断北迁、内迁，东北鲜卑相继南下，匈奴遗部仍在不断活动，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宁夏地区所属政权更迭变迁，曹魏、西晋、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先后主要控制宁夏南部地区，大夏、北魏、西魏、北周先后控制宁夏全境，各地方政权在宁夏的行政建置虽然屡有变化，但就核心行政城镇来看，宁夏全境最多似乎没有超出 10 个以上，即灵州、鸣沙、怀远、历城（建安）、临河、默亭、黄石、白池、高平（朔州、朝那）、都卢等，在数量规模上基本上没有超出统一王朝时代的行政城镇规模。

北宋、金和西夏时代，西夏控制着宁夏的中北部大部分地方，北宋和金相继控制过南部地区。西夏政权虽然在政区设置上有所变化，但在主体上还是继承了唐宋时期的郡县制度，据今人研究，州县主要分布于宁夏平原的王畿之地，在此设有灵武郡（灵州），下辖定远、怀远、临河、保静四县；另有华阳、赤源二县也分布于京畿所属南北不远地区；在南部设有韦州（今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其他设置多为军事要塞或军政合一的机构，具体位置多不明确^[7]。南部宋金辖区，由于这里是宋夏边界地带，建置以军政合一的组织为主。宋代的主要城镇有怀德军（治今宁夏固原北黄铎堡古城）、镇戎军（治今原州区）和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安乡老城村）。金统治该地区以后主要城镇有镇戎州（治今固原），下设东山县（在今固原以东）；德顺州（治今隆德县城），下辖隆德县（治今西吉县硝河古城一带）和陇干（与州同城）二县。另有平凉府化平县（今泾源县）。这样，南北合计总数约有12个左右。

综合以上论述，中国古代大的分裂时期，宁夏境内疆土的归属尽管多有变更，县级或者相当于县级以上的行政城镇的总数大概也在10个左右，与统一王朝时期相比，城镇的数量规模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自中国古代郡县制度设立以来，今宁夏境内县级以上城镇的建置规模是比较稳定的，稳定的程度是县级以上城镇基本上保持在10个左右。与此相应，2000年间此类城居的表现基本稳定。

（二）军事城堡

军事城堡约兴起于战国时代，秦国及秦王朝时代秦先后修建两条长城，一条是秦昭王长城，一条是秦始皇长城。这两条长城都经过今宁夏境内，只是行经地带有所不同。大约从战国以后，秦国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军事交通要道和长城沿线的重要关

口设置军事城堡，最著名的如秦楚古道上的武关，淆函古道上的淆关，晋陕黄河上的临晋关，以及关中南通汉中的大散关。尽管学术界关于上述诸关的兴筑年代尚存在争议，但战国时代秦国在一些重要军事通道已经修筑关堡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宁夏境内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关口设置关堡应该是可能的。据今人研究，今宁夏境内最早的军事要塞（堡垒）是战国时代兴筑的“西瓦亭（今宁夏西吉县将台镇明荣村）”和秦始皇时代修筑的“塞外浑怀障（今平罗县黄河东岸高仁镇附近）”、“神泉障（今青铜峡市峡口黄河东岸）”^[8]。前者在秦昭王长城防线上，后者在秦始皇长城防线以内。西汉时期今宁夏固原地区有著名的萧关，其具体位置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在秦汉时代，与郡县级行政城镇相比，较为单纯的军事城堡数量不多，它们零星地分布于宁夏境内的重要关口和军事要塞。其居住主体是军人，人数规模往往都不大。

与此大致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以前。北宋时期，由于宋夏之间长期对峙，宁夏境内军事堡垒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一书的研究和整理看，分布在今宁夏境内且位置明确或基本明确的寨堡有61个，其他今地位置不明的寨堡还有不少，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分布在今宁夏境内^[9]。至于西夏国内的军事城镇和寨堡，据有人研究也有不少，其基本建置有监军司、军和城寨，只是其数量和具体位置多不明确罢了^[10]。

时至明代，宁夏境内再次迎来一个军事城镇（含堡垒）高密度建置和分布的时期。洪武九年宁夏设镇，弘治十四五年固原正式建镇，今宁夏境内实际建置有两个重要的军镇，为九边重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镇之下一般设卫所堡垒等不同级别的军事据点，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准军事社会。由

此，经过多年的建置和建设，宁夏境内堡寨林立，蔚为一独特的居住景观。下面根据弘治、嘉靖两部《宁夏新志》的相关记载，整理其军事城镇（包括堡寨）如下。

弘治《宁夏新志》所载宁夏总镇属城：平虏城、灵州城、宁夏中卫城、广武营城、宁夏后卫城、兴武营城。所属关有：河西关、河东关、大坝关、镇远关。所属营堡有：汉坝堡、叶昇堡、任春堡、王宏堡、王泰堡、杨和堡、河西寨、河东寨、李祥堡、金匱堡、潘敞堡、陈俊堡、蒋鼎堡、邵刚堡、林皋堡、瞿靖堡、李俊堡、王全堡、魏信堡、张政堡、王澄堡、大坝堡、宁化寨、靖夷堡、杨显堡、陶荣堡、镇北堡、雷福堡、桂文堡、常信堡、洪广堡、镇朔堡、高荣堡、姚福堡、周成堡、丁义堡、李纲堡、张亮堡、谢保堡、宋澄堡、玉泉营、威镇堡、黑山营、平羌堡、靖虏营、安远营、定西营、太平营、永康营、怀远营，团庄280处。

灵州守御千户所所领寨堡有：枣园堡、吴忠堡、会安堡、汉伯渠堡。属城：大沙井城、石沟城、盐池城、隰宁堡、萌城、磁窑寨、清水营。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又有金积堡、中营堡、秦坝关、夏家堡、河东关堡、红崖站堡、半个城、马家园、胡家堡为其所领；属城也增加横城堡、红山堡、红寺堡等三堡。

宁夏后卫（治花马池）属城有柳杨堡、安定堡二堡。嘉靖《宁夏新志》增加“铁柱泉城”，该城于嘉靖十五年由尚书刘天和领导建成。

兴武营守御千户所属城有毛卜刺一堡。另有天池寨，在花马池西70里、兴武营东40里。该城池高大，是成化九年徐廷章所建，但嘉靖《宁夏新志》不载此城，应该是废弃了。

韦州城，洪武二十九年明封庆藩王于此，庆藩王于此居住九年，后移居宁夏。

庆王移居宁夏（今银川市）后，留群牧千户所官军驻扎在此，一方面护卫旧王府，同时也从事牧养业。

宁夏中卫领有一关，名胜金关。属城有：广武营、鸣沙州城、柔远堡、镇靖堡、镇虏堡、石空寺堡、枣园堡、常乐堡、永康堡、宣和堡、宁安堡、威武堡。按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嘉靖九年兴筑宁安新堡，则又增加一堡。在这些寨堡中，广武营和鸣沙洲城是中卫所属城镇，其余11堡为屯堡性质的寨堡。

南部固原镇的城镇堡寨，据《明万历固原州志》记载有45座，其名目分别是：固原州、白马城堡、海刺都堡、下马关堡、红古城堡、大湾川堡、镇戎所、平虏所、西安州、开城堡、马家砦堡、马祥堡、满受堡、马连川堡、扯木砦堡、高窑子堡、彭阳堡、马圈堡、杨见堡、甘礼堡、庙山堡、高山堡、李庄堡、毛家砦堡、苏什堡、张洪堡、魏信堡、观音堡、李景玉堡（以上州属）；张义堡、沐家堡、古城堡、张玄堡、杨名堡、蔡祥堡、李俊堡、平满堡、双峰台堡、臭水堡、山城堡、杨郎中堡、胡大堡、黑石头堡、马刚堡、任宏寨堡（以上固原卫属）^[11]。

根据以上诸志不同时代的记载和我们对其不完全的统计，估计明代宁夏五卫之地重要的军事城镇堡寨有100座以上，固原地区的城堡数量也在40余座，二者合计的数量规模比西夏时期同一空间的同类城堡数量可能要多得多。嘉靖后期至万历以后，宁夏境内可能还新筑了一些堡寨。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古水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设兵把守，后来筑城^[12]。类此者可能还有一些，这里不必一一考述。

清代初年，除了一些废弃的城堡外，大多数城堡被继承下来。康熙年间梁份西游，著有《秦边纪略》一书，其中讲到宁夏边堡，尚有常家寨、古水井堡、中卫、镇虏

堡、石空寺堡、枣园堡、渠口堡、广武营、大坝堡、玉泉营、平羌堡、镇北堡、宁夏镇、洪广营、镇朔堡、威镇堡、平虏城、横城堡、红山堡、清水营、兴武营、安定堡、花马池等 23 个^[13]。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各州县所属堡寨：宁夏县 21 个，宁朔县 23 个，平罗县 62 个（其中旧户占居 14 堡寨，其余 48 堡寨为新户，多没有建筑城堡），灵州 36 个，中卫县 19 个^[14]。诸州县合计 161 个。需要说明的是，清朝建立以后，满汉一家，海内清平，明代兴起的不少堡寨就已经开始民堡化。主要表现：一是堡寨驻兵越来越少；二是一些堡寨不再驻兵，纯粹变为民堡。《秦边纪略》记载，常家寨为民堡，不设驻防，渠口堡无防汛，以及当时重要堡寨兵员很少的情况，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的实际。又，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平罗县所辖 61 个堡寨中，其中 48 个堡寨都是新户所居，也多没有城堡建筑，显然这些堡寨都是民堡，不再具有军事性质。军事堡寨的民堡化是顺应当时社会环境变迁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和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中后期，旧时代的军事城镇、屯堡等逐渐实现乡村化，并演变为一个一个的城村或村落。

（三）市镇等商贸性质的居民点

在我国古代，市镇从行政城镇中独立出来并得到明显发展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南方地区市镇发展甚为迅速，北方较为滞后。宋夏对峙时期，今宁夏境内的北部属于西夏国领土范围，南部以固原为中心属于北宋的领地。当时两国之间的商贸来往有三种形式：一是贡使贸易；二是榷场贸易；三是民间贸易。贡使贸易在京城进行，榷场贸易则是在两国沿边重要城镇设立榷场，交易活动在榷场中进行的一种贸易形式。据研究，宋夏对峙期间，北宋仅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设立过两处榷场，其中镇戎军的高平寨在今宁夏固原市，保

安军则与宁夏没有关系。由此可见，贡使贸易和榷场贸易都还是在行政中心城镇进行的贸易形式。民间贸易一开始是以非法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宋夏双方顺应民间贸易往来的要求，各自在沿边堡寨或一些地点设置“和市”，即“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沿边地带也兴起了一些定期市场“会”^[15]，如咸平五年（1002 年）李继迁在赤沙川、骆驼口“各置会贸易”^[16]。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十一月，河东缘边安抚司说，“麟、府州民多賫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17]。这些由民间自由发展或政府在一些地点设立的“榷场”或“会”，是单一的商贸市场、市镇的早期形式。现有文献虽然不能够明证宁夏境内到底有哪些这样的场所，但我们估计在其境内存在着这样的居住形式。

元代控制这一地区后，这种性质的贸易场所和形式应当是被继承下来的，遗憾的是，元代文献甚少，特别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鲜有记载，所以其详细情况难以确知。明代，宁夏是边陲重镇，境内建置的绝大部分都是卫所堡寨，市镇、市场多依附城镇堡寨而设，独立于行政、军事城镇堡寨的商业性市镇尚没有形成。到了清代，海内一统，满汉一家，边疆社会在没有紧迫的边防任务中平静地运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旧日的军事堡寨逐渐民堡化、一般社会化；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和平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级城镇经济日渐繁荣，独立于地方行政中心城市的市镇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乾隆《宁夏府志》记载说“宁夏府城，人烟辐辏，商贾并集，四衢分列，阛阓南北，藩夷诸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矣。平罗、灵州、中卫城仅数里，多就通衢贸易，坊市故不分载。各堡寨距城稍远者，或以日朝市，或间日、间数日一市，或合数堡共

趋一市，大抵米盐鸡豚用物而已。其布帛什器犹多市于城。若灵州之花马池、惠安堡，中卫之宁安堡，当孔道，通商贩，其市集之盛殆与州邑等。”^[18]这里说的一些堡寨或者还处于初级市镇发展的阶段，它们以“或间日、间数日一市，或合数堡共趋一市”，发展为一方的经济贸易中心。它们的商业力量似尚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定居群体，除过交易日外，平时的市镇状态与一般村堡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可能也只是一些零星的店铺而已。因此，严格地说，这种形式的市镇还不是独立的商业市镇。而另一种类型的市镇，像上文所说花马池、惠安堡、宁安堡，“当孔道，通商贩，其市集之盛殆与州邑等”，则是真正的独立的商业市镇了。这种情况在清代前期已经形成，但总的数量毕竟不多。

二、乡居体制的时代变迁

乡居是针对郡县制度而言的地方社会组织形式和居住形式，乡居的本质含义是村落居住。从世界范围来看，村落居住形式诞生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城居的居住形式，这一点在我国各地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宁夏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约距今两三万年前，今银川市东南 19 公里处的水洞沟就有人类居住和生活，这就是现在非常著名的水洞沟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晚于这一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在宁夏不少地方也有发现，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分布更是不少（见表 1）。这些现象说明，大约从这一时期起，宁夏境内的早期人类已经逐步进入不同程度的村落生活。

表 1 表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宁夏境内人类活动是连续未断的一个过程，这些早期人类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原始群团、“血缘家族”、氏族社会和部落制的发展历程。其居住形式以集中居住的村落为主，房址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房屋三种基本形式。这种居址形式在今宁夏境内空间上的分布和异同虽然还不能明确地揭示出来，但进入前国家时代（或部落制时代），地面房屋越来越多的趋势却已显露出来，距今 5500 年~4900 年的隆德县沙塘乡和平村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6 处白灰面房基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点。前国家时代，社会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部落集团征战不已，迁徙不定。周兴华等以为，兴起于西北地区的“炎、黄族”就曾活动于今宁夏中卫黄河以南“香山”为中心的地区，并且认为现存于中卫的香山、大麦地和西山三个岩画区的万余幅岩画，特别是其中的龙、蛇图腾崇拜是其充分的证明之一^[19]。这一观点虽然尚不能认作定论，但上万幅岩画以及石器时代以来众多的人类活动遗迹表明，这里曾经长期稳定地生活着一个或数个较大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他们过着较为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居住形式应当是集中居住的村落。

表 1 石器时代宁夏境内的文化遗址与分布

时 代	文化遗址与遗址分布地	距 今 年 代	备 注
旧石器时代	银川东 19 公里处水洞沟遗址	2 万 ~ 3 万年	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文化，也有新石器文化
	固原彭阳县茹河流域、刘河等地		
	灵武横城堡、岭儿旧石器遗址		
	青铜峡市蒋顶乡贺兰山前台地鸽子山遗址	1 万年	该期遗址在宁夏黄河沿岸各市县均有发现

续表 1

新石器时代	海原县菜园村遗址		包括：瓦罐嘴、寨子梁、切刀把、二林子湾墓地、林子梁、马缨子梁等；发掘清理出房址 13 座，主要是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以窑洞式为主
	贺兰县金山林场遗址		
	盐池县官滩、硝池子遗址		
	同心县红城水遗址		
	西吉县兴隆镇西北 1.5 公里的遗址		
	隆德县风岭乡李世选村胜利队		
	海原县龚湾村河沟交汇的三角地带		
	原州区河川乡店河村西北山坡上、海家湾等地的遗址		
	彭阳县周家嘴头新石器遗址		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址一处；属于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类型
	隆德县沙塘乡和平村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5500 ~ 4900 年	发现圆形或方形的白灰面房基 6 处；下层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上层遗物具有齐家文化特征
	中卫香山三眼井乡新石器遗址		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彩陶器物皆有

据贫有强《宁夏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周兴华、马建兴《塞上古史钩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相关内容整理。

前国家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不少地方都已经进入城乡统一体的社会组织与结构性的居住时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发现有不少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20]，但在宁夏境内至今尚没有类似的发现，历史文献也没有相关部落都邑（墟）的记载，因此估计村落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基本的居住形式。

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夏商周三代 1300 多年间，由于当时比较强大的政治势力及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渭河流域的关中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宁夏地区的人类活动除了极为宽泛的“犬戎”、“西戎”、“鬼方”、“玁狁”或“熏鬻”等名号记载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外，其他的记载几乎都是空白，这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宁夏境内先民的生活

和居住情景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不过从情理分析，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活动在这一带的先民，在没有十分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外来部族广泛的种族屠杀的情况下，是没有理由不存在和延续他们的生活的。对于这两个条件，无论是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还是地质史研究，都没有相关的结论。因此，尽管“犬戎”、“西戎”、“玁狁”或“熏鬻”等名号显得过于宽泛，却难以掩盖石器时代以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众多土著氏族和部落的较为广泛的分布与存在。他们居住的基本形式应当还是村落，而村落中的房屋构成不外乎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式三种房屋形式。这种情况到夏商周时期大概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在宁夏南部今陕西、甘肃交界地带居住着几个部落方国：一是周先公公刘在夏朝末年率周

族北迁所居的豳（今陕西咸阳市旬邑县西）；二是阮、密、共三国^[21]。阮、密二国分布在今甘肃灵台县境，共国在今泾川县境。居于豳的公刘部尚处于聚族而居的部落式居住形式，其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是以部落家族为单位的农村公社。而后来的密、共二国已经是城国的居住形式，其城址已经被考古所发现。

战国秦汉以后，随着宁夏被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的正式统治范围以内的过程的进行和完成，郡县体制下的乡村居住形式作为制度化的产物被日渐普及和组织化起来。不过，直到元代及其以前，村落组织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一直不大稳固，所以《民国固原县志》说“秦筑长城于义渠，其进于村落之时欤。汉唐以降，密迩羌狄，变乱迭兴，人民居处仍疏疏落落，飘摇不定。”^[22]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1）历史上这里长期处于中原统一政权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北方、西方少数民族不断侵入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地区，统一帝国时期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秩序和地方管理秩序屡屡被冲击和打破；（2）即使是一些统一王朝时期，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和大一统的需要，不少侵入、迁入或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众以各种形式被安置在这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除了融合于汉民族中以外，一部分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己的部落或集团的居住形态；（3）由于地处边地，战乱频繁，历代统一政权苦苦经营的一体化社会组织形式屡遭破坏，汉民族人口稀少，在一些特殊时期，又经常住有大量的军队，甚至在一些特殊时期实际上形成一种“城郡”、“城州”、“城县”、“城军”的体制或居住形态，从而淡化了村落形式的稳定存在和发展。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些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关于这一时期，统一王朝郡县体制下可能的村落情况。由于没有直接的村

落记述文献，不少情况主要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来获得。西汉时期与宁夏相关的郡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安定郡，一个是北地郡。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下辖21县，有人户42 725户，人口143 294口，平均每县约2 051.1户，约6 823人；北地郡下辖19县，有人户64 461户，人口210 688人，县平均约3 393户，人口约11 088口。如果除去郡县城所居人口（无相关数字），每个县的乡居人户大概在1 000户~3 000户之间。如果按当时一般制度“一里百家”推算的话，一县大约只有10里~30里（村）的样子。按照前文所述，西汉稳定时期宁夏境内10个左右县级行政单位的话，那么其乡居人户大约在10 000户~30 000户之间，村落数量约在100~300个之间。西汉中期汉武帝北击匈奴以后，匈奴远遁，宁夏北部又驻扎了一些屯田军，所谓“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3]。东汉时期，由于羌人起义、迁入，鲜卑族入侵，宁夏境内村落大多废弃，乡居人口锐减。据《后汉书》记载，安定郡辖8城（县），6 094户，29 060人，每县平均761.7户、3 632.5人；北地郡辖6城（县），3 122户，18 637人，每县平均约520.3户、3 106人^[24]。一县只有数百户人，岂能谈到乡村的问题？所以当时的村落几乎荡尽，许多地方可能仅表现为“城郡”、“城县”的居住形式。史载，永平八年（65年），匈奴数寇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25]。永建四年（129年）羌人叛乱暂时平息，尚书仆射虞诩上书要求恢复以前迁徙的安定、北地等郡，朝廷派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激河浚渠，为屯田”^[26]。灵帝时期，“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

数”^[27]。这些资料，一方面表现了西羌、匈奴和鲜卑等部族的侵扰和杀掠及其所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却绝口不提村落情况。而从南部陕甘一些人口稠密地方的情况看，地方兴筑“坞壁”“以保聚百姓”。永和五年（140年）今青海一带羌人反叛，“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政府“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正是这种情况。^[28]相比之下，宁夏境内人口稀少，一县境内平均只有数百户人，最经济的方式恐怕就是采取“城郡”、“城县”的居住形式。这大概是当时文献但见城邑不见村落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中古社会发展最为鼎盛时期。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宁夏境内有10个县级以上城镇。杜佑《通典》记载，灵武郡或灵州，领6县，12 090户，53 700人；五原郡或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县），领2县，3 560户，18 200人；原州或平凉郡，领5县，户7 580，39 123人^[29]。若按县平均人户计算，灵州各县为2 015户，8 950人；盐州各县为1 780户，9 100人；原州各县为1 516户，6 520人。各县人口都不足10 000人，如果考虑到城居人口应当占有一定的数量外，那么村落人口肯定还要少一些。若按“百户一里”计算，各县乡村里数就在15里~20里之间。当然，这是按人口全部村居来算的，如果除去城居人口，各县里数比这个数字要小一些。据此，唐代稳定时期，宁夏境内理论上的村居分布和西汉时代相比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其次，关于这里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和村落体制不断被打破的情况。过去有人研究说，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中古时代结束，宁夏境内一直是一个民族交往、融合和流徙的大通道，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统一王朝正常的存在和发展秩序，经常被边地民族的侵扰和劫掠所打破，进而在频繁的征战

和政治博弈中造就了人口的多民族性和居住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一点的不说，就商周以来的情况看，宁夏境内不同时期活动的主要民族如表2所示。

表2 宁夏境内历代主要民族	
朝代	主要民族
商	西戎（鬼方、玁狁）
周	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
秦汉	汉、匈奴、月氏、羌
魏晋南北朝	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
隋唐	汉、突厥、敕勒、回纥、吐蕃、吐谷浑
五代宋西夏	汉、党项、吐蕃、鞑靼、女真
元明	汉、回、蒙古
清、民国	汉、回、满、蒙古

资料来源：陈明猷《宁夏古代历史特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这些民族中，秦统一以前是不存在中原政权统一的政治秩序被打破的问题，而是相反，在秦统一过程中，原来居住和生活在这一带的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相继被征服，伴随着这些民族的被征服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被纳入秦王朝的疆土范围以内，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以各种形式相继进入这里，这里原有的民族生存秩序被破坏或改造，并在郡县制体制下逐步成为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秩序的组成部分。随后，伴随着中原王朝国力强弱的变化，王朝更迭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动荡与战争，活动在边地的民族不断内侵和劫掠。这种情况在一些时期甚至非常严重，从而一次次不同程度地打破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而造成郡县体制下的村落体系的不完整或者在一些地方的彻底毁灭。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单于留塞内

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30]此次单于率14万大军南下，经行今宁夏境内固原、萧关等地，他们在长城以内活动一月余后才出塞，其中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东汉时期，活动在今青海、甘南一带的西羌诸部多次反叛，他们以种族部落为单位，数量有150余个，分散帐居，逐水草而居。诸部间或联合或相互残杀，争战不已。明初，先是叛乱于甘肃南部至兰州一线，后不断北移，东汉中期日益强大，并进至安定、北地、上郡一带，由此造成“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今甘肃陇西县南），安定徙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上郡徙衙（今陕西白水县城）。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31]很清楚，与宁夏境内密切相关的两郡被迫迁入内地，数百年来经营的村落体系遭到破坏，很多地方甚至荡然无存，只能靠一些“城郡”、“城县”来勉强维持（如灵州等）。史学家范晔说“故永初（107—113年）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骸，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32]陵夷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五胡内迁，“西北诸郡皆为戎居”^[33]。当时，宁夏境内主要由匈奴、鲜卑、羯、氐和羌人统治或占据。他们以游牧生活为主，以部族、种落为聚落，庐帐布野，村落荡然无几。这期间，先后建立的政权除曹魏、西晋为汉人

政权外，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和大夏国分别为五族胡人所立，后又有北魏、北周依次更迭。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就是不同时期的游牧种落也都变化频繁，迁徙无定。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再度统一，宁夏境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和村落体系再度恢复，但这期间先有突厥的不断侵扰，后又吐蕃的长期占据，新秩序不但多次被打破，而且长期不是很完整。陈明猷说“在唐朝收复都城长安之后的近100年之中，宁夏南部原州和东部盐州等地，经常被吐蕃军队所攻占。直到大中三年（849年），吐蕃内乱，唐朝收复原州等地，吐蕃人才撤出宁夏。”^[34]宋夏对峙时期，宁夏南北分别为两个政权占据，军事堡垒林立。元代，虽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元初宁夏境内破坏极其严重，有学者称，1226年成吉思汗征服宁夏，“它的领土变为无人的荒漠，城市为沙所埋”^[35]。后来虽经政府大力经营，但除宁夏平原地区农耕经济经移民开发和恢复外^[36]，南部固原和六盘山一带是安西王的封地，主要为蒙古人及其军队所驻扎，虽然军队在这里也进行了不少的屯垦，但总体上游牧活动占有较大的比重。

以上情况表明，西汉时期因郡县体制而建立的村落体系被冲击和打破以后，以后近1400年里，宁夏地区较为完整并持续稳定的地方村落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清时代才有所改变。

明清时代系统建立的地方堡垒及其民堡化和村落化奠定了宁夏近现代村落体系和分布格局的基础。陈明猷说“宁夏北部人口在明代最初10年里有过全出全进的大更新。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年），明朝将宁夏境内全部居民迁往关中，一度使宁夏府、灵州和鸣沙州等城成为空城。而在五六年之后又大量迁进新的居民，大

兴屯垦，军事卫所星罗棋布，从而奠定了宁夏近现代人口聚落的布局。”^[37]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宁夏境内军屯的数量总体上要大于民屯，星罗棋布的军事卫所堡寨主要是军士驻扎、守卫和从事屯垦的堡垒，军士中固然有约 70% 的人从事屯田，也有一定的“军余”相伴，但他们毕竟还不是一般的村民及其家庭成员，这和一般情况下的城村或村落还不完全一样。清朝建立以后，北方蒙古等部归附，长期的军事对峙和战争基本结束，这些军事卫所堡寨才顺应和平形势而日渐民堡化，最后发展为一个个村镇，从而实现了府州县体制下村落体系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建立。拿中卫来说，明代领 5 个千户所、50 个百户所和 11 个屯堡。这 11 个屯堡分别是：柔远堡、镇靖堡、镇虏堡、石空寺堡、枣园堡、常乐堡、永康堡、宣和堡、宁安堡、威武堡、宁安新堡。另有属城广武营和鸣沙州城 2 个城。^[38]乾隆时期，中卫已改为县制，下辖 19 堡寨，而明代堡寨和属城都沿袭下来，其中威武堡改名为“恩和堡”，俗称“四百户”。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渠口堡、铁桶堡、张义堡、永兴堡、张恩堡、古水堡等 6 堡。在这 19 城堡中，只有古水、常乐、枣园、镇罗（即明镇虏堡）、石空寺、广武营等 6 处驻有把总或游击设防，其余都没有驻防兵，变为单纯的城村^[39]。道光时期这些堡寨除了个别废弃

以外，大多都沿袭旧堡而发展。不但如此，围绕这些堡寨，散落的村庄也在和平年代迅速成长。

散落村庄的扩展大概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后逐渐进行。当时，社会承平日久，地方开发日多，堡寨居民外出垦地置庄的情况日渐增多，村落日渐发展。道光《中卫县志》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 年）建环洞排泄红柳山之水，后又引七星渠水浇灌白马通滩地，遂“招两河各堡民领地分垦，自红柳沟下至张恩堡，佃民随田置庄以居，分九段。今则土地开辟，村落相望。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秋七月，始于适中之恩棘段，因旧筑土垣，为设市集，以便民交易焉”^[40]。又，黄河以南香山一带，“民资水草牧耕，多因山崖筑室，或掏穴以居。旧有七十二水头，分东西八旗。今生齿渐蕃，皆成村落”^[41]。随着村庄的扩散，原有的城堡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行政中心或商业贸易市镇，中卫县在道光年间的地方市集分别在河南宣和堡、旧宁安堡、恩和堡、鸣沙州、白马滩、张恩堡、河北石空寺堡、枣园堡、广武堡^[42]，并与周边村庄和县城形成三级地方居住形式。这种居住结构和形式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地方居住的基本体系了。下面就道光《中卫县志》所载庄村列表如下，以便更明晰地看到这一点。

表 3 道光《中卫县志》所载庄村一览表

庄村	位置	附属	庄村	位置	附属
马槽湖	县北 30 里	附本城	康家滩		附宁安堡
黑林滩	县西 20 里	附本城	孔家滩		附宁安堡
常家湖	县北 15 里		柳马滩		附宣和堡
倪家滩	县南 10 里	附本城	白马滩		
姜家滩		附镇罗堡	黄辛滩		附鸣沙州
田家滩		附石空堡	野猪滩		附张义堡
蒲王滩		附枣园堡	乏马滩		附张恩堡

续表 3

拜滩		附渠口堡	深井庄	西 10 里为靖远县界，蓄户	东一旗
寺儿井	香岩寺山下	东一旗	官庄子	在寺儿井下	东一旗
苦水沙河		东一旗	韩锁井		东一旗
红泉庙		东一旗	大柳树		东一旗
罗全湾		东一旗	赵麻井		东一旗
骡马井		东二旗	羊儿水		东二旗
史家水		东二旗	骚羊水		东二旗
小柳树		东二旗	红圈子	庄南 15 里至靖远县界	东二旗
高泉庄		东三旗	张家窑头		东三旗
碾盘水		东三旗	孙家山		东三旗
放马岭		东三旗	吴布袋		东三旗
三岔沟		东三旗	乔家寨		东三旗
伊家寨		东三旗	杏树沟		东三旗
刘家山		东三旗	校尉川		东三旗
党家水		东三旗	红石堡	县南 30 里	西一旗
乱柴沟		西一旗	醯佛台		西一旗
高家水		西一旗	涧沟儿		西一旗
清土崖		西一旗	黄沙水		西一旗
铜场堡		西一旗	寺口子		西一旗
狼嘴子	蓄户	西一旗	甘柳树		西一旗
七棵树		西一旗	大涝坝		西一旗
土圈		西一旗	柴家畔		西一旗
西芦泉		西一旗	乱井子		西一旗
任厨寨	南 3 里靖远县	西一旗	土坡		西一旗
白土崖		西一旗	黄家套		西一旗
鸦儿崖		西一旗	韩祥水		西一旗
绽家水	西 10 里靖远县界	西二旗	车路沟		西二旗
罗锅井		西二旗	芦草井		西二旗
磨儿井		西二旗	高崖水		西二旗
周家寨		西二旗	牛条岭		西二旗
红寺台		西二旗	滚子井	南 5 里靖远县	西二旗
窑洞水		西三旗	蔺家寨		西三旗
高峰子	庄路南靖远县界	西三旗	景家寨		西三旗
三眼井		西三旗	张蛮圪塔		西三旗
新庄子		西三旗	黑龙井		西四旗
上下石棚		西四旗	韭菜沟		西四旗
白崖子		西四旗	新水村		西四旗
七眼井		西四旗	耍崖	县东南 230 里，分三庄，皆回民。	附鸣沙州堡
康马头	近耍崖皆汉民	附鸣沙州堡			

三、居住形式与地理环境

法国地理学家阿·德芒戎研究欧洲农村的居住形式时说“房屋是地理环境的表现。应当把这个环境理解为自然和人文影响的整体，它能决定农民采取这种或那种住房。”^[43]历史时期宁夏的居住形式也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环境整体而言，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地区西北边缘，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地貌状况造就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交错带的地域特性。由于这样的地域特性，历史上农业、牧业两大文明在这里不断碰撞、冲突、融合或彼消此长的运动过程，不断地扰动着当地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成果，以及社会物质文明的表现——居住形式的稳定存在和发展，上述两种类型的居住形式的时代变迁已经多少反映了这一特点。造成这种变化的主体力量源自不同时期社会控制力量的消长和政治环境的频繁变化。在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居住形式之间除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居住形态在不同的自然区域表现出不同外，同一地区的居住形态在时间上的差异也是多变的。对此，下面按两大类分别综合性地加以说明。

（一）城居与环境适应

与乡居村落相比，城居形式不但晚出，而且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要弱得多，它更多地是人类在对社会环境适应中追求安全需要和防卫需要的创造和表现。如前所述，历史上宁夏城居形式主要有三大类，即行政城镇、军事堡寨和商业市镇，其中行政城镇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后，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城居主体形式。军事堡寨因为宁夏地处边塞的原因，历史上诸多朝代在此多有建置，但在规模上时有变化。而商业市镇在宋代以后才比较普遍地从行政城镇中分离出来，并随着农村商品贸易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较多地发展起来，而至明清时期日渐发展为较为普遍的一级居住形式。由于制度原

因或时代差异，在一些特定时期，还存在过与一般行政城镇并行的分裂时期的都城或统一时期的王国城邑等，前者如赫连夏时期的高平、西夏时期的兴庆府，后者如元代安西王府、明代庆王府和清代的特殊建置——满城。这些城居形式的出现都不能认为是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主要是特殊的人文环境和人力所为。当然，如是说并不意味着这些城镇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没有若何关系，只是表明它们不是当地地理环境的专制性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先秦时代前期，这里还只是草原文明的世界，没有城镇，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受中原城居文明的影响而有了城居现象，但也只是分布在南部边缘与农耕文明的交界线上。关于它们的具体形态和布局目前尚不清楚，但从义渠国一个不大的游牧部落国家有如此众多的城郭（秦国曾一次攻取 25 城）情况来看，它们大概是一种类似部落方国或族国的居住形式，这是防御中原王朝领土扩张过程中被迫建立的城居形式，也是中原城居文明送给义渠等国的一个无奈的礼物。自此，草原牧猎环境的专制与开放率先在宁夏南部被摧毁。随着秦汉帝国的领土扩张和占领，广袤无垠的宁夏草原结束了自然主义的牧放时代，开始被纳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的版图内，而行政城镇的移入则成为胜利者的光荣与自豪。至于亘古未变的大草原在以后近两千年间不断迎来了一批批它的掘墓人——农人及其管理者。在他们的作用下，开发条件优越的宁夏平原、清水河谷地等草地、疏林景观率先变为农业景观。秦汉帝国的第一批行政城镇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内地移民的渐次迁入，农业景观的面积不断扩大，这里因此而发展为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区，行政城镇就是依托这些农业经济区而建立并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这从秦汉到明清时期行政城镇比较稳定地分布在这里可以得

到充分的证明。这种分布格局显然是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环境整体所造成的。

除了宁夏平原、卫宁平原和固原盆地外，宁夏境内的其他地区多为黄土丘陵、沟壑和山地环境。而苦水河、黄河以东属于鄂尔多斯台地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毛乌素沙逐渐南移，使这里处于沙漠和黄土混交的高原草地面貌，降雨量稀少，人力灌溉条件差，农业开发有限。即使这样，在一些局部地方如盐池县北张家场古城为中心的地区的，秦汉时期还是形成了朔方郡城。据说这是朔方戎部过去活动和生活的地区，农牧业开发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秦汉以来在此建置朔方郡城。即便如此，在固原以北六盘山地以东，中卫、中宁平原以南和宁夏平原以东的广大地区直到晚清时期安置回民以前，一般行政城镇的分布一直非常稀少。直到现在，宁夏境内虽然已经建立了 20 个县级以上城市，但这一带却还只有海原、同心和盐池 3 个县城。因此，地理环境的专制性影响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在一些地方的专制性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却是难以改变的，甚至是不可改变的，除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出现了超越这一自然环境，或者新技术能够大规模地利用和开发这样的土地资源的时代的到来。

城镇位置在选择上比较普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由于生活用水的专制性要求，不少城池的位置选择在河流近旁和泉水附近，这既是城镇选址的一般规律，在宁夏境内也不例外，此无需多谈。只是，宁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重地，一些城镇堡寨的位置选择，除了考虑一般必要的立城要素以外，军事因素常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宋夏或明代修筑的不少军事堡寨，除了大部分因与环境整体因素关联而继承下来以外，那些修在重要关口和军事防御重要线路上的堡寨，特别是后来相继废弃的堡寨，

较多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位于盐池县（明代宁夏后卫花马池所在地）西南约 90 里铁柱泉古城，这是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 年）始营造的一座军事堡垒。之所以建造这一城堡，是因为这里有一池神奇的泉水。明人胡侍《铁柱泉颂》说“铁柱泉者，淳泓霭沦，广百其武。历四序而盈科，饮万骑以靡涸。兴武（营）之野，方数百里，绝无水泉，胡马南牧，兹焉是赖。”^[44]管律《铁柱泉碑》铭说：“……水涌甘冽，是为铁柱泉。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虏入寇，往返必饮于兹。是故散掠灵、夏，长驱平、巩，实深借之。以其婴是患也，并沃壤视为弃土百七十年矣。”^[45]《碑》、《颂》两文所谈泉水的情况基本一致，应是事实。但《碑》铭所言“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并认为此“沃壤视为弃土百七十年”是因为明代前期 170 年间忧患蒙古人南下牧马劫掠的缘故，这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就逻辑关系言，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诸朝 60 余年间，蒙古诸部南下并不甚多，明人尚无需太多的忧患。至于蒙古人较为频繁地从宁、延二镇之间南下，主要发生在河套蒙古诸部兴起以后。因此，所谓“弃土”并不是管律所说的“忧胡”所致，而是本身的自然条件较差而长期无人问津，以至于铁柱泉直到嘉靖年间筹划防务时才被“发现”，其贫瘠的环境和荒凉的程度可见一斑。据此，所谓“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大符合实际情况的夸张。而就历史过程看，明代以前这里未曾有过城镇设置的记录，明代前期 170 年，特别是最初的 60 余年，如果这里果真如管律所说是“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为什么当时有条件开发这里而实际上却没有开发？答案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这里不是所谓的“沃壤可耕之地”。2010 年 8 月 15 日，笔者前往铁柱泉古城址考察，所

看到的景象是：颓塌的城垣孤寂地躺在稀疏的白草荒棘之中，城内外破碎的砖块瓦片俯拾皆是，城内泉水已经干涸难觅，而在城东门外数十步有一池塘，当地向导说那就是铁柱泉，这显然是不对的。城周围数十里为黄沙以及沙生植被覆盖，汽车穿行在沙地小道上，比较艰难，甚至有些地段难以前行。站在古城墙上，极目远眺，除了近城的铁柱泉村十数间低矮的房屋外，人烟极少，远处更看不到有村落和房屋。来去途中数十里的乡路几乎看不到人烟。这是今天的情形，古代的情况又怎能和今天相比呢？对于这样的环境怎能说是沃壤数百里？因此，铁柱泉城的修建纯粹是为了控制铁柱泉这一池泉水，使它不被南下的蒙古人马所利用。从军事上讲，它是要断绝蒙古人的水源补给，遏制他们进一步南下劫掠。另外，在该城以南 100 里左右的“梁家泉”也修上了城，用意与此一样。这些在《碑》、《颂》两文中已经谈得很清楚。

有些城池的位置选择与当地的特殊环境有关，如张家场秦汉古城，其东北不远处便是裸露的盐池。而古盐州城、明清花马池城、盐池堡等都与盐业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宁夏境内城镇的形态基本上都是有城墙围护的方形城，城墙和城内房屋墙体都是就地取材的黄土，房顶材料如砖瓦、木材等，都是当地提供的。城池在建造技术和总体形态设计上与中原同期城池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主体建筑材料来看，土城占到 99 % 以上。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石城，如明代满四曾占据的石城^[46]，但数量极少，即使在六盘山山地，这也是一种特例。从秦汉时期张家场古城遗址大量残存的砖瓦碎片看，秦汉时期砖瓦烧造技术不但已经传播到宁夏，而且烧造技术相当纯熟，当时城镇主要房屋屋顶的建筑材料已广泛使用了砖瓦屋顶与装饰。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少数民

族的侵扰或驻足或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有所打断或减弱，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主流存在和发展。拿西夏国来说，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在没有建国前以部落为单位，庐帐为居室。在北迁和占据宁夏等地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开始定居，而且也从事筑城建设。1024 年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在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修建了一个城，该城名省嵬城。宁夏博物馆经过对该城的发掘和研究，发现全城很少见到砖瓦碎片，并据此认定城内绝大部分为“土建筑”，西夏早期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47]。但随着李德明和李元昊父子二代相继以灵州和怀远镇（后来定为都城，先后名为兴州、兴庆府）为都城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营造^[48]来看，土城墙体、各种形式的砖瓦及其饰件和大量木材的结合仍是都城建筑的主体，虽然这一点因为历史上的破坏已经难以清楚地证明，但从现存西夏王陵陵园内大量砖瓦碎片、砖瓦饰件残片，以及可能是大规模木构建筑的陵冢柱洞，都能够得到明确的印证。就是说，经过了很短的时间，党项族贵族已经完成从庐帐居住到土屋、再到公室等居住和营造的过程，宁夏城居的历史再次回到以前的主轨道上。这样的过程在宁夏城居史上因为不同民族的入住曾不同程度的多次出现，但文明的反征服过程却一次次使它与中原城居文明的总体进程基本上保持一致。另外，像中原地区广大城镇一样，城墙墙体包砖的情况直到明代才在一些主要城镇开始进行，这一进程也与中原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异。

除了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以外，宋元以前，宁夏地区的城镇一般在布局结构上比较简单。从现存古城址，如张家场古城、黄铎堡古城、西安州古城、元代安西王府城、韦州古城等来看，政府衙门或核心机构常被一道内城墙或内城围护起来，从而使政府机关与居民所住地区分开来，这一情况在西夏统治的夏州城（即十六国大夏国

国主赫连勃勃所建的统万城) 也有非常明确的表现, 大概当时比较盛行这种做法。居民区内, 民房一般都是单面平房, 较为低矮, 既保暖, 也挡风。直到现在, 一些老城镇的旧房屋, 如韦州镇古城址内还有不少这样的房屋, 显示了历史建筑与民俗的延续。明代以后, 这种区分和隔离的居住形式很少见了, 各级城镇中普遍盛行的是居民与各种衙门机构交错的居住形式, 并且各个居住单元形成独立院落。如明代宁夏镇城, 城内各种居住单位或机构, 如庆王府、帅府、总兵官宅、太监宅、都司署、都察院、中卫、前卫、城隍庙、文庙、木厂、射圃、都司马营、草场等等, 一般都是有围墙围护的独立院落。与此相对应, 城内形成不少的“街坊”: 熙春、泰和、咸宁、里仁、南熏、平善、毓秀、感应、清宁、修文、乐善、广和、备武、澄清、积善、众安、宁朔、永康、崇义、镇安、慕义、效忠、遵化、养贤、毓才、肃清、镇靖、凝和。市集分布在这些坊间或大街上。^[49]这种布局结构形式后来为清朝所继承, 除了部分机构和场所或名号有所变更外, 总的格局没有变化。与明代不同, 清代在宁夏城外还建有一个“满城”, 这是专门为满洲驻军等人所建造的城池, 既体现了满人在清代的特殊地位, 也反映了他们对于汉族等人的戒备。该城雍正元年建筑, 位置初在宁夏府城外东北处, 后因乾隆三年地震废毁, 乾隆五年移建至府城西 15 里处。新建城池高大, 周回 7 里 5 分, 城墙“俱甃以砖”。城池四门, “东曰奉训, 西曰严武, 南曰永靖, 北曰镇朔”。这一取名鲜明地体现了朝廷在这一带的统治精神, 也展现了它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意向。城池在建构上特别讲究它的军事性和防御性。城为正方形, 有 4 座城楼、4 座马道、4 门瓮城与城门楼、4 座角楼、8 座铺房、24 座炮台、24 道水沟和 1 道护城河, 东、西、南、北 4 个城门楼两边各有 2 个火药楼, 与城内

其他 8 条街道相对应。这样的形象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 城内东西、南北两大街为主, 三横三纵共 9 条笔直的大道将城内分为 16 个相等的方形社区。街道命名, 除南北、东西大街外, 其余 8 条街全部用“正黄旗、正红旗、正白旗”等正、镶旗旗号命名。^[50]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非常严正的秩序观念和警示作用, 体现了乾隆盛世时期满洲人统治的决心、力量和精神。回顾历史, 蕴含在满城中的力量和精神, 似乎只有十六国时期匈奴人所建的统万城可以与之相比。从这一意义上看, 它代表了帝国晚期宁夏境内传统城池修筑水平的最高峰。

宗教建筑和居住景观是城镇稳定、变迁以及居民生活与精神状况的重要标志, 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服从社会需要的一种适应形式。历史上, 宁夏境内城镇的宗教(包括民间信仰)景观大体上有 6 种: 儒家孔庙、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回教清真寺、基督教堂和一般民间信仰庙坛等。儒家信仰从汉武帝时代起开始以制度的形式在全国范围传播, 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虽然在边疆地区的推广总体上可能比较薄弱, 但在宁夏地区总体上一直是当地社会的一种稳定、持续的社会信仰, 尽管其中存在着因为社会动荡而动荡的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背景下, 不同时代的地方统治者及其城居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履行着儒家的一套治世原则和道德伦理, 因而使它一直处于儒学文明和信仰的地理范围内。即使在党项族统治的西夏时期, 他们“得中国土地, 役中国人力, 称中国位号, 仿中国官属, 任中国贤才, 读中国书籍, 用中国车服, 行中国法令”^[51], 也没有放弃和摒除儒家信仰。后来包括元代蒙古人统治和清代满洲人统治都是如此。

佛、道景观最初主要在山林清静之地, 它们何时进入这里的城市, 因资料缺乏明确的记载, 不甚清楚。但自西夏以后, 随着党

项统治者的广泛推崇，佛教景观迅速在城市及其附近建立起来，如兴庆府及其附近的承天寺、高台寺等，韦州的康济禅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另外，大概从唐代吐蕃占据宁夏部分地区以后，这里开始成为藏传佛教的影响地区之一，唐代佛教寺院兴建的情况因文献缺载尚不是很清楚，西夏、元时期，藏传佛教景观如韦州城西北隅的小白塔、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贺兰县的宏佛塔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虽然只有韦州城西北隅的小白塔建在城内。

回教寺是回族形成并定居宁夏城乡的历史见证。学者普遍认为回族在元代开始形成，并在西北广大地区定居下来。发展至今日，宁夏成为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城居情况，元代以前不甚清楚。明代时，宁夏镇已有“回回”^[52]居住，城内有“回纥礼拜寺”^[53]是为明证。清时宁夏城内有3个清真寺：一在静宁寺西，一在什字北，一在镇远门南^[54]。城市街道也有以回族住户或坊寺命名的，如礼拜寺街（在镇远门南）、纳家巷（在镇武门东）、礼拜寺巷（在南薰门东）、中礼拜寺街（在镇武门东）^[55]。同治年间（1862—1874年）回民起义以后，一部分回民死亡或外迁，遗留的部分人员，按照清朝的新政策，不允许他们住在城内，回民城居的情况有所改变，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改变过来。

基督教，唐贞观九年（635年）由西域传入长安等地，当时称景教，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后，几乎销声匿迹。元建国前，蒙古人西征后再度传入，并随着蒙古人的南征和建国流入中国内地。按照陈垣先生的研究，其传入途径是先于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之地，后随蒙古人南下弥漫内地^[56]。宁夏为边陲重镇，蒙古人占领该地后，随军一部分基督教徒及其家属可能留居于此。所以，元代初年马可波罗行此地，说有“基督教堂三所”。此教堂或

在“哈刺善”城，或在“额里哈牙”州城。据冯承钧注，前者或指贺兰山下离宫，后者指今宁夏城，也就是今银川城^[57]。不过，明清以后基督教基本上退出了宁夏地区，很少有文献再记及此事。

道教和一般民间信仰宋代以后在中原本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宁夏地区虽地处边地，但历来不乏汉族民众各等人口的分布，其信仰也应是比较普遍的，只是由于相关建筑景观比较少见，历史文献又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其详细情况就难得确知了。明清时代各种制度性、民间性信仰景观建设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几乎所有府州县都建有大量的祠寺庙观，如社稷坛、先农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文庙、武庙、关帝庙、厉坛、文昌阁、魁星楼、城隍庙、八腊庙、马神庙、龙王庙、三皇庙、三清观、东岳庙、火神庙、真武庙等等，名目繁多，祭祀和崇拜对象非常多样。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当时宁夏府城有此类建筑83座，平罗县14座，灵州17座，中卫县34座^[58]。而宁夏南部固原城及其近郊也有38座相关建置^[59]。就其和城镇的关系而言，大部分景观分布在城镇及其近郊。当时宗教发展比较开放，儒、释、道、佛诸家和地方民间信仰并行发展，各不侵犯。不但如此，诸家合流的趋势和实践也在一些景观场所和信徒住地有所表现，现存中卫县的高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卫高庙位于中卫城北隅，占地面积4100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庙内砖雕牌坊上有一副对联“儒释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化尽在此间。”庙里供奉有佛、菩萨、玉皇、圣母、文昌、关帝等，是一座儒释道合流的综合性庙园。所有这些寺庙坛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仰复杂的城市环境，展现了官方到一般社会民众城市生活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况。在这些城镇中，清代新建的满城是个例外，城中除分布有几处关帝信

仰的关帝庙外，其他信仰景观并没有建造，鲜明地体现了清朝八旗军人生活的特质和追求。总之，明清时代，宁夏地区的城居生活总体上笼罩在人为所创造的神性世界的阴霾之下，人性的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居民生活除了衣食住行方面较为艰苦外，在精神生活方面显得极其沉重。当然，这些并不能代表地区城镇的个性特征，它是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生活的共性反映。从这一点讲，它和中原地区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二）乡居与环境适应

乡居是与城居相对应的一种居住形式。历史上宁夏地区的乡居形式有两大类：一是定居形式，一是非定居形式。定居形式是进入国家社会以来居住的主流形式和常态表现；非定居形式在前国家社会是当地主流的居住形式，在进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以后则成为一种非主流、非常态的居住形式。前国家社会的情况，如夏商周时代的西戎、鬼方、乌氏、匈奴、义渠等部族，他们以部族为单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战国时期虽然南部地区也出现义渠等部族模仿中原王国筑城而居的情况，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处在游牧部族的控制中。中原王朝统一这一地区以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和居住状况。这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建立郡县制度，二是通过农业移民和屯地开发。二者的统一及其长期发展，比较稳固地建立了与中原王朝相统一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定居农业逐渐成为当地主导的经济方式，与此相应，村落也日渐成为主流的乡居形式。但在20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它的北部和西北部是茫茫的蒙古大草原和阿拉善草原，西南过陇西地区又是青海草原和川西北山地草原。受这种环境的天然影响，特别是历史上经常面临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占领，非定居的居住形式依然存在。《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曹魏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60]。西晋时期，就连关中地区百万人口中，也是“戎狄居半”^[61]。隋代初年，陇右地区“俗不设村坞”，“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62]因此，估计今宁夏不少地区也当与此相类。历史上，活动在宁夏地区的游牧民族先后迭有变化（见表2），其基本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也大体一致，即主要以家族、部族、部落联盟等形式存在和活动，居住一般采用“庐帐”形式，这一居屋形式类似今天我们熟知的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西夏以游牧民族占据宁夏，建国后一部分游牧民众还依然采用这种形式，《宋史》记载，“其民一家号一帐”^[63]，是其明证。史金波说，西夏游牧民的居住形式是“帐毡和毛棚”，也就是帐篷，其大小以支撑帐篷的木杆的数量（如七十木、六十木）来衡量^[64]。“庐帐”式居屋最初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中间实行，后来随着国家社会的日益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日益加强，逐渐发展为定居或半定居的“庐帐”，放牧业也逐渐固定在一定的区域。西夏境内的游牧状况在国家建立以后可能以这样的形式为多。这种发展过程和趋势显然是受定居农业文明及其经营方式的影响所致。大约到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统治的日益加强，特别是政府大力组织移民、招民，以及军屯、民屯等形式开发当地土地资源，扩大和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庐帐”式居所依凭的游牧环境逐渐得以改变，这种居住形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

定居的乡居形式是宁夏历史上乡居形式的主流形态。按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分为农业村落、民屯堡寨、官营牧马场等。

农业村落，特别是作为国家编户的村落从秦汉以后可能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但由于边地长期的战争的影响，在随后的若干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大稳定。同时，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对于明清以前的详细情

况我们尚不能获得清晰的了解。大致了解的情况是：（1）村落规模一般都不大；（2）村落有城村、非城村以及数户散居等三种形式。村落规模不大，主要原因是边地人口稀少造成的，另外与边地较长时期政治环境不大稳定也有密切关系。民国《固原县志》述其村落情况，固原辖境辽阔，地广人稀。四乡中，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为一村者；甚至一家一村，而彼此相隔数里、数十里不等者。^[65]城村的情况在秦汉时代大概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了，来源有两种：一是秦汉政府移民实边，有组织地迁移内地民众开发宁夏平原和宁卫平原一带，为了安全考虑而建立的；二是当时及其以后历代军屯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城村。元代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此宁夏向东走，他说宁夏以东天德军（今内蒙古托克托东西）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66]。以此推测，城村是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上从事农业居民的一种基本的村落形式之一，宁夏境内当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这样的城村。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一些民堡更是这一形式的典型表现。至于说不少屯堡在后来也相继民堡化，并在清代中后期多发展为各种级别的城村，在现在的很多村镇中都能找到其间的延续关系。非城村形式和散居民户两种形式大多分散于宁夏南北各地，而散户更多地分散于南部山地。构成村落的居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仍然以低矮的平房和窑洞为主。两种形式因村落所在地形状，或二者兼有，或以窑洞为主，或以平房为主。平房是适应当地比较干旱的气候条件而形成的一种房屋建筑形式。这是因为黄土高原上一年四季降雨稀少，特别是宁夏中北部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200毫米~300毫米，加之，当地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缺乏较为粗大笔直的木材等建筑材料，所以在屋顶处理上一

般百姓住房多建成平顶。又由于当地风沙较大，为了防风、保暖，房屋建得比较低矮。这种居屋建筑很早就为当地人们所认识，并形成建筑民俗。如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陶屋葬器模型（现藏固原市博物馆），说明这种平顶式房屋在当时就是一般的居屋形式了。以后直到明清时期，以及近现当代还在广大城乡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

窑洞形式的居屋是黄土高原地区农村居民比较普遍的居住形式之一，也是适应当地环境的代表性居住形式之一。一来由于黄土的特性，能够满足人们挖掘洞室；二来窑洞内冬暖夏凉，适应人们的需要；三来，当地气候干旱少雨，窑洞可以避免长期雨淋所造成的毁坏。更重要的是，当地自然环境较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比较低，一般社会生活比较贫困，窑洞的建筑成本很低。所以自石器时代以来，这种居屋形式一直流行，明人杨一清说，“土人以窑洞为家，乃其素习”^[67]，即其反映。这一情况，直到当代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天然的制约，长期以来形成的村落依然比较广泛地分布于河流、泉源附近，这一方面是居民生存的基本生活用水的来源，一方面由于气候干旱，如果没有水源，居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甚至牧业生产都难以得到保障。水井虽然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但在这一带村落位置选择的解放上依然没有表现出广泛而深切的影响。如乾隆时代的盐茶厅（今属中卫市海原县）地处六盘山山区，不少村落依山泉水而形成。此录《乾隆盐茶厅志》相关记述，制表4如下，以见一斑。

表 4

《乾隆盐茶厅志》记载海原县山村与泉水关系

地 名	泉水与村落生活、灌溉状况
五泉	源出华山，甘泉数十道，随地涌出。……本城及城南北之羊房岔、白家墩口、王家庄、李家庄、五里墩皆赖之。
芦茨沟	沟南山颠有小泉数眼，水流不绝；山根大泉一眼，阔丈有余，深倍之。回民七十余户，皆赖山田以生。
大山口	有泉眼十七眼，旧为本城及庙山、牛房三堡十九庄浇灌之用。
小山儿	有泉十余眼，不择地出，虽沙土壅塞而激射自如。
安桥门	山峡中有大泉一眼，小泉七眼。又西半里为茨沟儿，大泉仅二眼。两水会于干沙沟，灌溉七庄地亩。
山汉河	河内皆乱石，石中有大泉二眼，出水胜于诸泉，而待泽之村庄已多。
菜园	平地大泉一眼，小泉三眼。去菜园十里余，曰陡沟儿，皆须此五泉以活。
东河、西河	西安州南十余里，地名苾冲山塬，有泉五眼，水流不竭，州人称为东河。西安州南十余里，地名堡子台、齐家湾，有大泉一眼，小泉五眼；又刘家湾大小泉十眼；狼沟儿泉四眼；张家湾大小泉十三眼；以上各泉皆在干河之内。北流三十里，州人称为西河。沿河村落并西安州新旧城皆沾足焉。
蒙古堡	西南四五里有泉之处：一曰龙官沟，一曰挖狼沟，一曰深沟，一曰毛草滩，一曰窖子沟门，各有大小泉四五眼、十余眼不等。……其水皆入干河，自南而北，河东西村落二十余处，皆资利赖焉。
芦沟堡	南有大泉一眼，浇灌堡十余里。
乱泉子	有泉数十眼，乃十庄用水之地。
郝家沟	有大泉一眼，亦有小泉一眼。二泉合流六十余里，至双河堡而式微。
甜水河	在红古城西门外，味甘可饮，且便于灌溉，居人引之以种稻。

资料来源 《乾隆盐茶厅志》第七卷《水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由于宁夏地形的基本构成是宁卫平原以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宁卫平原、宁夏平原沿黄河分布，而黄河以东至盐池县又是鄂尔多斯台地，即沙漠草原景观。所以自古以来，村落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平原地区和河谷山地一带。唐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说“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明人诗说“会看居上人烟胜，鸡鸣犬吠闻边陲”；“路入灵州界……禾稼碧连空”。^[68]主要都是就平原地区而言的。河东地区虽经历代不同程度的驻军和移民开发，但总体上村落的分布还是比较稀少的，并且这些村落与河流、泉水的分布密切相关。

明代今宁南地区有不少地方是国家和一些藩王和公侯的牧马草场分布地，其中直

接管理和从事牧马、养马的民众、军人，多以堡寨或村居形式，分散居住于牧马场中。先是庆王朱楠的牧地设置在今同心县、下马关和韦州一带，专设宁夏群牧千户所守卫并从事牧放。永乐四年（1406年）以后政府开设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每寺统六监，监统四苑”^[69]，其中长乐、灵武二监下辖开城、广宁、黑水、清平、万安等苑，俱在平凉府固原州地方^[70]。这些苑，初“多不曾修建衙门、城堡，及虽有城堡，年久坍塌，又皆无营房、马厰。苑官多僦屋而居，或宿窑洞。所养官马昼夜在野”^[71]。后经杨一清整治，先后规划修建城堡、马厰营堡等，形成固定住所。今海原县、西吉县一带，从明初以来先后沦为诸藩王的牧场。《乾隆盐茶厅志》记载：“厅地自太祖时以赐楚、沐、韩、肃诸藩，

沦为牧场。……明洪武三年（1370年），以西安州、五源川等处十八堡赐楚王为牧地，而海喇都与焉。沐家营、小沐家营，沐藩得之；韩府湾等处韩藩得之；群牧所等处肃府得之。”^[72]在这些藩王牧场中，楚府以西安州、海喇都为中心，牧马营地有军校2000余名；黔宁王沐英以沐家营（今西吉县）为据点，占据平凉西北大片牧场；韩王府以海城县李旺镇韩府湾为基地，肃府占据西吉县西南大片牧场^[73]。各藩王、公侯府各自建置营堡，以军人或各色人等牧放其中。清代建立以后，牧场时代结束，这些地方也先后得到开发，至乾隆时期，“迄今百年，户余十万，口不下百万矣”^[74]。此说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亦反映出民的成长和村落日渐稠密的趋势和状况。

总之，在传统农业时代，宁夏地区乡居

社会是以定居农业为主体，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家庭畜牧业的村社性质的社会。居民居住的基本形式是村落，村落因其形成特点的不同，不同程度地存在有城村、一般村落、堡寨村落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都比较强烈地依赖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的基本安定，特别是清代以来比较大规模的地方开发，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村落规模日渐扩大；随着水利灌溉事业的日益扩展，村落在空间上不断得到解放，并沿着灌区的扩张不断伸展，村落数量不断增长。但这样的发展，依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表现在居住形式上，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是传统农牧生产方式及其发展程度，以及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吴忠礼，鲁人勇，吴晓红. 宁夏历史地理变迁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12-13.
- [2]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五十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885.
- [3] 后晓荣. 秦代政区地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70-177.
- [4] 后晓荣. 秦置郡图 [M] // 秦代政区地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5] 吴忠礼，鲁人勇，吴晓红. 宁夏历史地理变迁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按：该著以为泾阳、乌氏二县治所也在今宁夏境内，似不确，因未列入。廉县，一说在固原东北、环县南部（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50 页第18 注）.
- [6]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分册） [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 [7] 杨蕤. 西夏地理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8-140.
- [8] 吴忠礼，鲁人勇，吴晓红. 宁夏历史地理变迁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14-15.
- [9] 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北宋陕西五路、麟府地区寨、堡垒建置一览表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47-261.
- [10] 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05-311；杨蕤. 西夏地理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0-147.
- [11] 明万历固原州志 [M] // 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 明清固原州志. 宁夏回族自治区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2003：73-75.
- [12] 乾隆宁夏府志 [M]. 陈明猷，点校.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03.
- [13] 梁份. 秦边纪略 [M]. 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297.
- [14] 乾隆宁夏府志 [M]. 陈明猷，点校.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30-151.
- [15] 吴天墀. 西夏史稿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6.
-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 [M]. 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 [M].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乙卯.

- [18] 乾隆宁夏府志 [M]. 陈明猷, 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202.
- [19] 周兴华, 马建兴. 塞上古史钩沉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15-24.
- [20] 钱耀鹏. 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21] 周振甫, 译注. 诗经译注 [M] // 诗经 (卷7) 大雅.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14.
- [22] 固原县志办公室. 民国固原县志 (上卷) 之三·居民志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171.
- [23] 汉书 (卷九十四) (上) 匈奴传六十四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770.
- [24] 后汉书 (志第二十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519-3520.
- [25] 后汉书 (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七十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49.
- [26] 后汉书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93.
- [27] 后汉书 (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八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90.
- [28] 后汉书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95.
- [29] 杜佑. 通典 (卷一七三) 州郡三 [M]. 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1995: 2370-2371.
- [30] 汉书 (卷九十四) (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761-3762.
- [31] 后汉书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87-2888.
- [32] 后汉书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99-2900.
- [33] 晋书 (卷九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549.
- [34] 陈明猷. 宁夏历史人口状况·贺兰集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31.
- [35] [苏] 密尔彼尔德. 成吉思汗及其遗产 [M] // (日) 内田吟风等.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472.
- [36] 吴宏岐. 元代农业地理 [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7: 30-33.
- [37] 陈明猷. 宁夏历史人口状况·贺兰集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34.
- [38] 嘉靖宁夏新志 [M]. 陈明猷, 校勘.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219、234、236.
- [39] 乾隆宁夏府志 [M]. 陈明猷, 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149-151.
- [40] 道光·中卫县志 (卷二) 建置考·堡寨 [M].
- [41] 道光·中卫县志 (卷二) 建置考·堡寨 [M].
- [42] 道光·中卫县志 (卷三) 贡赋考·税课 [M].
- [43] [法] 阿·德芒戎. 人文地理学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217.
- [44] 嘉靖宁夏新志 (卷三) 宁夏后卫 [M]. 陈明猷, 校勘.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244.
- [45] 嘉靖宁夏新志 (卷三) 宁夏后卫 [M]. 陈明猷, 校勘.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243.
- [46] 马文升. 西征石城记 “石城者, 东西俱山, 左山峭壁高数十仞, 无径路, 上者俱拽绳而登, 西山顶平可容数千人。城中无水, 有数石池。外设栈道, 而栈道下则筑小城护之。前有小山, 高亦数仞, 如拱壁状, 两傍空处并后面悉筑墙, 高亦二丈五六尺, 各留一小门, 仅容单人马过之, 不知何代人造此以避乱者。城外皆乱山, 形甚恶, 人至此毛发耸然。”
- [47] 负有强. 宁夏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物古迹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79.
- [48] 史金波. 西夏社会 (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31.
- [49] 宁夏城图 (卷一街坊、市集) [M] // 弘治宁夏新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 [50] 府城图, 满城图, 卷五城池 [M] // 乾隆宁夏府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五〇) [M]. 庆历四年戊午.
- [52] 弘治宁夏新志 (卷一人品) [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 [53] 弘治宁夏新志 (卷一寺观) [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 [54] 乾隆宁夏府志 (卷六坛庙)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186.

- [55] 乾隆宁夏府志 (卷六街巷)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203 – 204.
- [56] 陈垣. 元也里可温教考 [M] //明季滇黔佛教考 (外宗教史论著八种).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56.
- [57] 马可波罗行纪 [M]. 冯承钧,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163 – 164.
- [58] 乾隆宁夏府志 (卷六坛庙)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181 – 195.
- [59] 宣统固原州志 (卷二祠宇) [M] //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 明清固原州志. 宁夏回族自治区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 2003: 201 – 202.
- [60] 晋书 (卷九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549.
- [61] 晋书 (卷五十六) 江统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33.
- [62] 隋书 (卷五十三) 贺娄子干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352.
- [63] 宋史 (卷四八六) 夏国传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028.
- [64] 史金波. 西夏社会 (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97 – 698.
- [65] 固原县志办公室. 民国固原县志 (上)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293.
- [66] 马可波罗行纪 [M]. 冯承均, 译. 上海: 上海书店, 1999: 164.
- [67] 杨一清. 杨一清集 (上册) [M]. 唐景绅, 谢玉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0.
- [68] 弘治宁夏新志 (卷八杂咏类) [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 [69] 明太宗实录 (卷五十九) [M]. 永乐四年九月壬戌.
- [70] 杨一清. 杨一清集 (上册) [M]. 唐景绅, 谢玉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1 – 22.
- [71] 杨一清. 杨一清集 (上册) [M]. 唐景绅, 谢玉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0.
- [72] 乾隆盐茶厅志 (卷三) [M]. 刘华, 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26.
- [73] 乾隆盐茶厅志 (卷三) [M]. 刘华, 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30 页注释.
- [74] 乾隆盐茶厅志 (卷三) [M]. 刘华, 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2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idence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Ningxia in History

Liu Jingchun

Abstract: The main residence types in Ningxia ar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giatura in history. The existence of villeggiatura in Ningxia and the Central Plain is nearly at the same time , which is a little earlier than the city – resided , and is changed frequently later. While the city – resided type obviously exists later tha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three main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town , military castle and commercial town under the prefecture – county system , in which the commercial town is the latest to occur. The administrative town changes little in the later historical movements and the military castle is the major type in the Song , Xia and Ming dynasties. The divisions of th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giatura are obviously affected by the local environment , while some military castles are affected by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 These residence types are limi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economic system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so no real changes happen.

Key words: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 Ningxia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 resided and villeggiatura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sidence types and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 孙颖慧)